



(六)

新文化運動的擴展(上)

五四事件以後，中等以上學校的男女青年搶盡了風頭。但這不只是一棒學生運動，還有教授、教師和作家等新知識界領袖們，在後面提供了有力的見解。陳獨秀、胡適、蔡元培、李大釗、錢玄同、魯迅、周作人、劉半農、高一涵，以及「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其他撰稿者，連同進步黨（如林長民和汪大燮，皆被視為親美派）和國民黨（如王寵惠）的一些較年長的政治領袖們，都激勵了學生對當時國事的興趣，並使他們注意到現代世界的真實性，因而鼓舞了這個運動。雖然，這些領袖們並未直接倡議五四當天的示威，但此派中的激進人士曾經宣稱，青年應負責監督政府決策和實行社會改革。由此看來，示威遊行可說是這些領袖們教誨的必然

果。

從事件開始起，新知識界領袖們就是對學生最熱烈的支持者。蔡元培和其他大專院校校長的抗議和辭職，是學生所獲最有力的精神支持。當事件發生於北京時，胡適和蔣夢麟正在上海迎接杜威，直到五月六日才知道消息，他們和杜威立刻表示同情學生運動。當運動於六月初達到高潮時，陳獨秀、胡適、高一涵和其他教授們，實際加入了學生的反軍閥行動，在街頭熱情地散發傳單以支持學生及抗議軍閥。陳獨秀則因他本人的積極參與，以及據稱和布爾雪維克在上海的出版物有關，而於六月十一日被捕，入獄達八十三天。他是在散發「北京市民宣言」時被捕的，宣言中要求罷免徐樹錚和其他親日官員，撤除北京警察總部，並保證市民集會和言論的絕對自由。並且提出建議：假如政府不肯接納所求，則市民應採取「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

學生在事件中的活動雖然蓋過了教授和教師們，但在其後兩個月裏，運動變成大多數新知識分子的聯合行動。北京政府對教育工作者不分青紅皂白的壓制，促使他們較前更緊密的結成一體。事件結束後，新知識界領袖的融合和對軍閥的憤怒，清楚地表現在他們慶祝陳獨秀於一九一九年九月獲釋出獄的詩文中。「新青年」在五卅事件後首次出版的十一月號，刊出了有關這個主題的白話詩。胡適寫了一首「威權」，此詩後被收入中學教科書，為中國青年所廣泛閱讀過。詩中形容「威權」坐在山頂上，指揮連枷的奴隸們為他開礦，奴隸們挖了一萬年後，山終於被挖空，「威權」也被摔死。劉半農則寫了一首長詩，以類似的主題來抗議權威。李大釗那首激昂之作是直接寫給陳獨秀的，他也強調「強權和威力，終竟戰不勝真理」，並謂陳已實踐了那句話：「出了研究室便入監獄，出監獄便入研究室。」

陳獨秀以一首長詩來答謝這些情誼，詩中說明他信仰博愛和寬恕。在這個時候，陳的作品中表現出浪漫主義和人道主義的混合思想，而不具馬列主義的色彩。他相信舉世中人，包括專權者、經濟剝削者、政治壓迫者和軍國主義者，都是兄弟。他們應被拯救、喚醒和啟發，而不應被仇恨。他的詩肯定「當真徹底的人，只看見可憐的弟兄，不看見可恨的仇敵」，「同情」會使所有人團結起來。這種信仰便是他的「真神」。

新知識界領袖們雖已因抗議精神而聯合，但他們在尋找可共同接受的理論時，却遇到更大的困難。雖然如此，有一項原則已於一九一七年後被逐漸接受，做為他們行動的基礎，這就是經由重估中國所有的傳統和引介西方的觀念，來創造一個新社會和新文明。

在攻擊傳統主義和軍閥主義上，蔡元培當時曾做過一個巧妙的比喻。他的文章題為「洪水與猛獸」，一開始就提醒讀者，孟子在兩千兩百年以前，即把中國歷史上的動亂喻為洪水猛獸。蔡引此喻來說明五四運動。新思想是洪水，但他並不以洪水只具傳統式的反面力量，假如河川疏通而阻物移去，洪水的力量能被控制，當可在灌漑上造福百姓。反之，捨疏導而用阻撓的方法，洪水就可能泛濫與毀滅萬物。蔡並將猛獸比成吃人的軍閥。就他看來，中國當前的要務，是「有人能把猛獸馴伏了，來幫同疏導洪水，那中國就立刻太平了」。

五四事件後的數月內，知識分子間的新力量和團結的事實，造成「新青年」及「新潮」的重組和擴充。「新青年」原來顯然沒有任何正式的組織，從一九一七年秋天起只有一個鬆懈的編輯委員會。雜誌也未具備明確的綱領，每位編者或作者都各說各話，彼此觀點頗見不同。後來「新青年社」成立，開始較有組織。一九一九年多，「新青年雜誌宣言」終於發表，它的內容如後：

本誌具體的主張，從來未曾完全發表，社員各人持論，也往往不能盡同。讀者諸君或不免懷疑，社會上頗因此發生誤會。現當第七卷開始，敢將全體社員的共同意見，明白宣布。就是後來加入的社員，也共同擔負此次宣言的責任。但「讀者言論」一欄，乃為容納社外異議而設，不在此例。

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已經造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

我們相信世界各國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因襲的舊觀念中，有許多阻礙進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們想求社會進化，不得不打破「天經地義」「自古如斯」的成見；決計一面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面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的，創造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的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

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偽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醜的，惡的，戰爭的，軋轢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至於消滅。

我們新社會的新青年，當然尊重勞動；但應該隨個人的才能與興趣，把勞動放在自由愉快藝術美化的地位，不應該把一件神聖的東西當做維持衣食的條件。

我們相信人類道德的進步，應該擴張到本能（即侵略性及佔有心）以上的生活；所以對於世界上各種民族，都應該表示友愛互助的情誼。但是對於侵略主義佔有主義的軍閥財閥，不得不以敵意相待。我們主張的是民衆運動社會改造，和過去及現在，各派政黨絕對斷絕關係。

我們雖不迷信政治萬能，但承認政治是一種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眞的民主政治，必會把政權分配到人民全體，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無職業做標準，不拿有無財產做標準。這種政治，確是造成新時代一種必經的過程，發展新社會一種有用的工具。至於政黨，我們也承認他是運用政治應有的方法；但對於一切擁護少數人私利或一階級利益，眼中沒有全社會幸福的政黨，永遠不忍加入。

我們相信政治道德科學藝術宗教教育，都應該以現在及將來社會生活進步的實際需要爲中心。

我們因爲要創造新時代新社會生活進步所需要的文學道德，便不得不拋棄因襲的文學道德中不適用的部分。我們相信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破除迷信妄想，是我們現在社會進化的必要條件。

我們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權利，已經是現在社會生活進步的實際需要；並且希望他們個人自己對於社會責任有徹底的覺悟。

我們因爲實驗我們的主張，森嚴我們的堡壘，寧歡迎有意識有信仰的反對，不歡迎無意識無信仰的隨聲附和。但反對的方面沒有充分理由說服我們以前，我們理當大膽宣傳我們的主張，出於決斷的態度；不取鄉愿的

，紊亂是非的，助長惰性的，阻礙進化的，沒有自己立腳地的調和論調；不取虛無的，不着邊際的，沒有信仰的，沒有主張的，超實際的，無結果的絕對懷疑主義。

這篇宣言有幾點應加注意。首先，它代表一種深具國際氣息的理想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混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許多國家的知識界領袖懷有類似的想法。一九一九年三月，「精神獨立宣言」在法國發表，各國的知識界要角簽名支持，其中包括法國的羅曼羅蘭，英國的羅素，義大利的克羅齊，美國的亞當斯（Jane Adams）等多人。他們在宣言中斥責當世的知識分子放棄獨立的精神和思想，向武力投降，並為政治、黨派、國家或階級利益而參戰。他們提倡全民民主和各國親善。該宣言曾被譯成中文，在同年十二月的「新青年」和「新潮」發表，「新青年雜誌宣言」多少受到它的啓發與影響。

其次，這篇宣言顯示出杜威的實驗主義在大多數中國知識界領袖中贏得了好感。馬列主義的思想在此並不明目，雖然不久以後，它即被李大釗、陳獨秀和其他學生與作家等中共發起人所推廣。此時做為一種哲學和科學方法的實驗主義，都凌駕於辯證唯物論之上；階級鬭爭的觀念，也被陳獨秀及大多數其他的中國知識界領袖所明確拒絕。

再者，新知識界領袖們於一九一七年結合在北大及新青年雜誌時，他們同意不涉身政治。但在這篇宣言中，他們承認政治是公共生活中重要的一環，政黨也為政治理想應用到實際生活時所必需。不過，他們仍然嫌惡跟已有的政黨連繫。

另有一例也說明了新知識分子團結力的加強。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新潮」的一羣改組為社團，並且擴大其綱領。除發行月刊外，還開始出版一系列的叢書，包括翻譯西書在內。有些新工業家提供的財力資助，使得新潮社能够推行此事，並選派會員出國留學。

在這種環境下，新知識分子的活動頗有增加。他們的活動主要是朝兩條路線發展：一為「新思想」出版物

的增加和相伴而來的新觀念之傳揚，另一爲社會團體和社會服務的創設。

中國的新聞出版業在一九一七和一八兩年有些進步，但五四事件以前，大多數的出版物在內容上仍嫌老舊。一九一九年四月以前的中國期刊，除了少數例外，都是刊載文言作品。按其性質可分爲四類：最公式化的是政府的各種官方公報，它們以月刊或週刊的形式出之，常有不足取的官僚氣味。第二類是各級學校當局或學生出版的期刊，此時它們在數量上激增，但內容不外是課堂作業或毫無啓發性的老套文章，例如「漢高祖封項伯斬丁公論」等題目，以及鬼怪故事之類。第三種是爲一般讀者而設的雜誌，通常是無所不談，但凡事欠缺立場，也鮮具文學的價值。第四種是評論性的刊物，它們時常刊載文章支持傳統並提倡「國粹」——顯明之例爲古代倫理的「三綱」，即「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只有少數的評論性刊物留心當時的社會或科學問題，如「太平洋」、「新青年」、「每週評論」和「科學」，代表了具有現代眼光的人士所編出來的佼佼者。在最後一種期刊中，幾乎全是一九一五年以後創辦的，不然也經過徹底的改組，同時使用的是白話文。

前面所說這種呆滯和落後的情況，並不只限於期刊界，它表現在當時中國所有的出版物上。胡適於一九一七年夏自美返國時，就無法找到一本是過去七年內出版的中文哲學書。他在上海窮一天之力，才搜到一部「中國哲學史」，但據他說，該書作者的貢獻只是略謂「孔子既受天之命」和「與天地合德」。胡適因此而感嘆：

總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國的出版界——這七年來簡直沒有兩三部以上可看的書！不但高等學問的書一部都沒有，就是要找一部輪船上火車上消遣的書，也找不出！（後來尋來尋去，只尋得一部吳稚暉先生的「上下古今談」，帶到蕪湖路上去看。）我看了這個怪現狀，真可以放聲大哭。」

西方著作介紹到當時中國來的，幾乎全限於十七或十八世紀的出版物。甚至連教英國文學的老師也不知道高爾斯華綏（Galsworthy）或蕭伯納（Bernard Shaw）的大名。一位讀政治和法律的大學生也不知道日

本是個島國，以及日語和英語是大相逕庭的。雖然這只是大眾無知的特例，但公平地說起來，在一九一七年以前，西方知識的介紹極為有限，而且中國的出版事業也很沉滯。這種沉滯或可直接歸因於一九一四年後，一連串嚴苛的新聞和出版法規所致，雖然國內外的戰事和其他更深遠的肇因，構成了知識發展受阻的基礎。到了一九一七和一九年間，情況有了一些改善，不過大部分仍只限於北京的知識分子，和其他城市的少數幾個學校而已。

但在五四事件以後，中國出版業有了可觀的發展。一九一九年五月和六月裏，當學生們正在進行罷課、罷工、罷市和抵制日貨的宣傳時，他們出版的許多刊物是用白話文，不過送交政府的文件和嚴肅的宣言屬於例外。事實證明，用口語撰寫比用文言更具效果。結果在事件後的半年內，中國出現了約四百種的白話文新刊物。以下是一些重要的新刊物，它們在這段時期及往後數年裏，都在國內造成很大的影響力：

刊物名稱	創刊時間	地點	立場
新青年(月刊)	一九一五年九月	上海	獨立
太平洋(月刊)	一九一七年四月	上海	獨立
每週評論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	北京	獨立
新潮(月刊)	一九一九年一月	北京	獨立，學生辦
公民(月刊)	一九一九年一月	北京	獨立，學生辦
新教育(月刊)	一九一九年一月	上海	獨立
星期評論	一九一九年六月	上海	國民黨機關刊物
少年中國(月刊)	一九一九年七月	上海	少年中國學會
建設(月刊)	一九一九年八月	上海	國民黨機關刊物

解放與改造

一九一九年九月

上海

進步黨機關刊物

少年世界（月刊）

一九二〇年一月

上海

少年中國學會

這些是較著名的幾種。其他數以百計的新刊物，通常是短命或影響力較小的。不過，它們的刊名就顯示出當時的趨向。有一種月刊叫做「曙光」；其餘類似的名稱有「青年與社會」、「社會新聲」、「新社會」、「新中國」、「進步青年」、「新生」、「新氣象」、「民鐸」、「新人」、「熱潮」、「平民」、「光明」、「救國」、「自由」、「新學報」、「新文化」、「新學生」、「工學」、「向上」、「奮鬥」、「覺悟」、「平民道德」、「平民教育」、「科學與教育」等。同時還有「新婦女」、「女界鐘」，甚至有學生們自己創辦的「小學生」。有些刊物專門討論哲學、音樂、繪畫、文學，或一些自然及社會科學，它們實為各種專業雜誌的先驅。新出版物幾乎涵蓋了現代知識與生活的所有重要層面，其中有許多過去從未為國人所周知，介紹的方式當然也有別五四運動以前的時期。

另一方面，新刊物像美國的「小雜誌」一樣，表現出雄圖大志和熱忱，有時却不免帶有自負。它們經常以高調宣示綱領和目標。例如，「少年中國」宣稱要獻身於「社會服務，在科學精神引導之下，以實現創造少年中國的理想」。「救國」雜誌則建議「提倡大眾教育，以救社會」。「新婦女」的目標是「喚醒婦女做為改革社會的一種手段」，而「女界鐘」的目標也是「教育婦女，使她們參與建設社會進步」。這些新刊物的口號率多如下單調的語句：「從物質和社會上改造國家和社會」，「研究社會及經濟問題，傳播新思想」，「介紹新思想給國民，提高他們的人格，同時發展本國工業」，「喚醒工人和改造社會」，「促使學術進步，以便運用研究和批評的觀念來改造社會」，「研究社會和介紹西方思想」，「提倡新的白話文學和大膽的批評」，「發表人民對外交政策的意見，並指出外交對國家的重要」，甚至如一種刊物所說的，「介紹新思想給世界，用樂觀

與批判的態度去重建社會」。一九二一年夏，杜威在調查了這些刊物後加以評論說：「這些刊物很多當然是短命的，正和它們都太具雄心壯志一樣，但說明了五四運動的獨特精神。」刊物短命的原因，部分是青年欠缺持久的耐心所致，但有許多個案說明了這些刊物受到軍閥政府的阻迫，或受礙於混亂的內戰和社會的不安。

這些新刊物因產生一項卓越的事實而值得受到重視——它們將中國青年知識分子介紹給民衆，並爲彼此之間提供了一條通道。這些知識分子在隨後的數十年裏，成爲中國社會、政治或文學方面的要角。的確，五四事件後這幾個月裏的「期刊熱」，對中國輿論的發展和新知識分子的塑造來貌，都有劃時代的貢獻。

五四運動不僅興起了新刊物，而且刺激了舊雜誌和報紙的改革。原有的期刊如「東方雜誌」、「教育雜誌」、「小說月報」、「婦女雜誌」、「學生雜誌」、「中華教育界」等，也改用白話文，並開始介紹現代西方的思想和知識。爲了便利和加速這些改變，老編輯幾乎全被激進的、具現代觀念的年輕人所取代。一九一九年六月，已有十五年歷史的領導性期刊「東方雜誌」（創立於一九〇四年），宣布在編輯政策上要做一種根本的變革，以求「追及世界之進步」。七月時，編輯一改過去保守的立場，宣稱中國雜誌應緊隨世界界的潮流，放棄「反動的保守主義」並體認當前的情勢，迎接實際生活之所需，同時要爲將來的進步而準備，不要再沉緬於對過去的回憶裏。一九二〇和二十二年，該誌開始以白話文發表文章，並邀胡適之擔任編輯。「小說月報」改革得更徹底。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二月，沈雁冰（後來以筆名矛盾著稱）受邀爲編輯，到了次年一月，這份已有十一年歷史的月刊就完全易轍。當代西方文學譯成了中文，中國新文學作品也開始以專刊出版。後來成爲著名哲學家的李石岑，此時新任教「育雜誌」的編輯，也做了極敏捷的反應。一九二〇年一月以後，它的社論和文章都出現白話文。「婦女雜誌」和「學生雜誌」也換了編輯。所有這些創刊多年的雜誌都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事實上，當時該館被守舊的保皇黨餘衆所控制。孫中山先生於一九二〇年初，就曾指責它是壟斷中國出版業的反動機構。

五四事件以後，所有大城市的報紙也受到革命潮流的影響。其中很多添加了專欄或出版增刊，以排印新文

由權威教授
專家執筆的
翻譯天地
RENDITIONS MONTHLY
每冊 NT\$20
全年 12期 NT\$200
郵撥 111701
電話 3318080

葉歸何處	30 元
地上的雲	40 元
簡宛榮譽著作	兩冊合購 55 元
書評書目社出版	郵撥帳號一九二七四

學作品和討論文化與學生運動。那些未能反應大眾要求的報紙之命運，可以上海一家著名的「時報」為例來說明。它在一九一九年以前頗受中國教育界的愛好，但一九一九年以後，當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轉向新途時，該報仍固執傳統的形式和內容，結果發行量銳減，而且立刻被迫停止出版。與此相反的是，「時事新報」和「民團日報」因為同情新運動，旋即贏得了知識分子和青年的喜愛。

新書和譯著也較過去的發行量為大。五四事件後緊接的幾年內，至少有四十八家出版社印行了西方著作的中譯本。商務印書館是全國最大的書店，它在一九一二年出版了四百零七種書，一九一五年是五百五十二種，一九一九年是六百零二種，但在一九二〇年就高達一千兩百八十四種。一九一九和二〇年中國出版業的快速擴，可按這幾年進口紙張的增加數而索驥，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的新出版物都是用進口紙印刷。從一九一八到二一年，這些進口物增加了一倍有餘，這是五四事件以後中國出版業「茂盛」的又一證明。